



The Consequences of
Power under Accounta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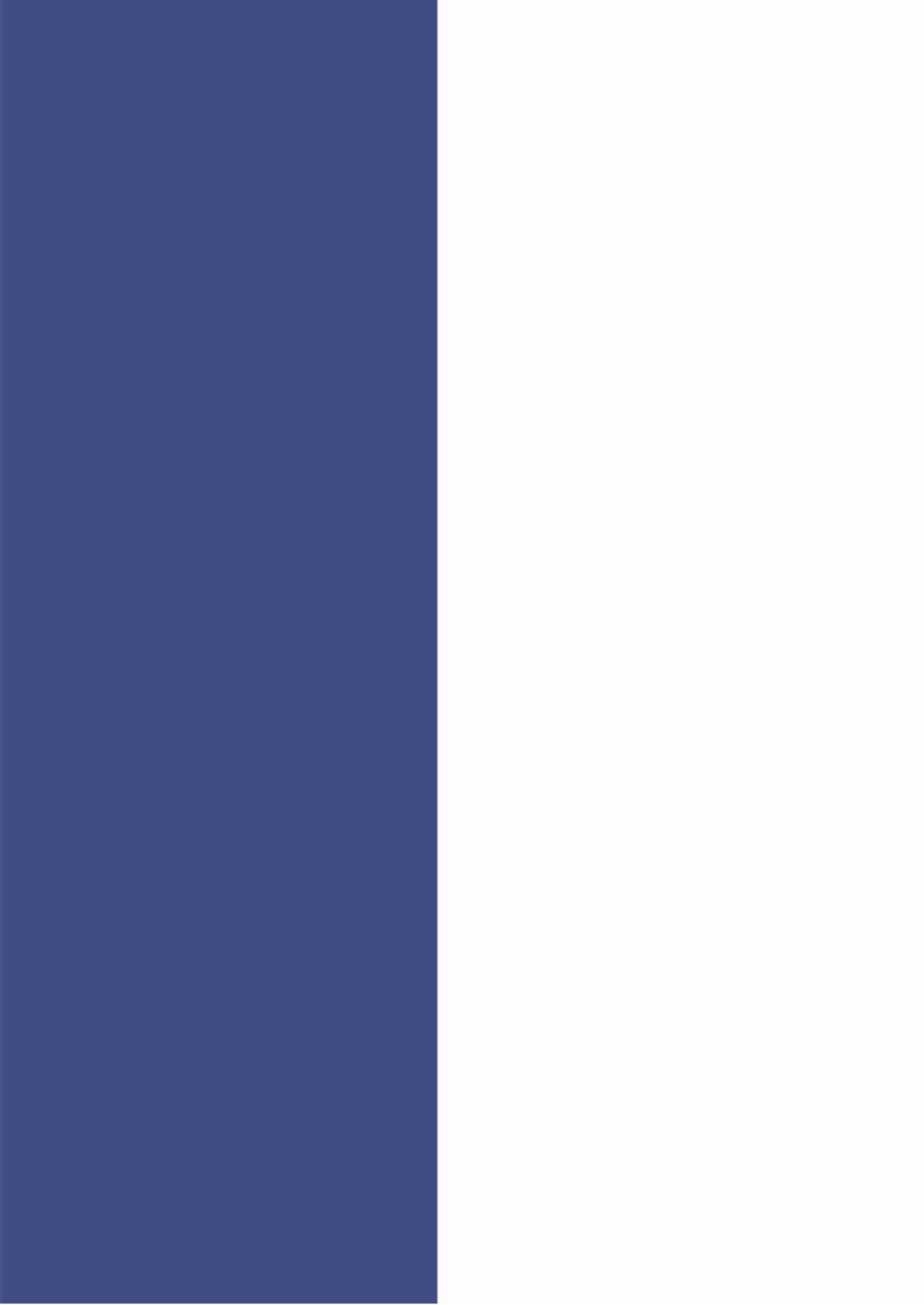
问责条件下的 权力效应研究

韦庆旺◎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是权力。权力之于社会科学，
就像能量之于物理学。……社会动力学的法则只有放在权力的
框架下才能得以阐明。

——罗 素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阿克顿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 子

ISBN 978-7-5308-9679-2



9 787530 896792 >

定价：28.00元

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研究

韦庆旺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研究 / 韦庆旺著. -- 天津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08-9679-2

I. ①问… II. ①韦… III. ①行政权力—研究—中国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289号

责任编辑: 张建锋

责任印制: 王 莹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出版人: 蔡 颢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022)23332390

网址: www.tjkjcbbs.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7.25 字数 98 000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前言

从大学开始，我的学习和研究兴趣一直被宏大的问题所吸引。对权力的研究产生兴趣，源于2006年读博士二年级时，阅读文献时看到罗素的一句话：“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是权力。权力之于社会科学，就像能量之于物理学。……社会动力学的法则只有放在权力的框架下才能得以阐明。”当时，正迷恋于“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该理论用“心理距离影响认知的解释水平（抽象程度）”这一观点来阐述决策等各种心理现象，与勒温当年提出的心理空间概念遥相呼应，颇有整合众多心理学知识的潜力。在这个当口，突然看到一篇最新的文献将“解释水平理论”应用到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之中。马上在自己心里认定要做权力的研究。

2008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权力差异和社会动机对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影响》通过答辩。6月，顺利获得浙江大学博士学位。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然后连续发表了几篇与权力研究相关的论文。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笃定了要回答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根本问题——“权力如何才能不腐败？”结合跨文化及本土心理学，对西方权力的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责任”的角度对权力进行重新构念化，是我找到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最终，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成为我的博士后研究的内容。在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本书。

首先，本书对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和问责进行了批判性综述。指出当前的权力研究过于重视权力的“独立”和“自由”含义，强调权力对于权力大的人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权力小的人具有消极作用，忽视了权力在社会情境中包含的“责任”含义。在综述问责效应和机制的基础上，引入“问责”以弥补权力研究的缺陷。

然后，设计了两个实验室模拟实验考察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研究1采用囚徒困境游戏，发现在有问责比无问责的条件下，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竞争行为。研究2采用整合式谈判任务，在限定了亲社会（与利己相对应）的规范之后，问责条件下谈判组的固定馅饼知觉偏差更

少（权力大的谈判者贡献更大），问题解决行为更多，联合收益也更多（研究2实际上是从问责与社会规范的视角重新分析及梳理了博士论文的研究3）。两个研究表明问责确实对个体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要看特定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背景隐含的对行为的评价标准。在相互依赖的亲社会行为规范的问责下，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能为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以中庸实践思维体系为框架，提出了重视“责任”含义的权力研究构想，其核心是将权力放在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社会情境中，指出在问责的条件下，可以激发权力大的人的“大我”意识，从而做出一系列为他人和集体利益着想的积极行为。

虽然这些内容成书出版之际，距离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完成已近4年之久，但是，重读这些内容，仍能感受到它在当时自成一体的阶段性特征。本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始终是我所关切和重视的。掩卷怵思，最近这4年来不少的研究想法在这本书中都能找到萌芽。也许，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此，最终决定不做内容更新及修订工作，让这本书去完整呈现当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原貌。

受到时间发展因素的影响，加之个人能力和功力积累的不足，4年之后看当时的内容，难免有不少粗糙错漏之处，祈望读者和同行不吝批评指正！

2008—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期间，非常荣幸地得到合作导师俞国良教授的指导。跟俞老师一起工作的过程，让我虽然以非学生的身份开展工作，但是又从俞老师那里得到了像老师带学生一样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关切，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一段人生重要经历和宝贵经验，不仅在学术积累上，更从心态准备和为人处世上获益颇多。在此，对俞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此外，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的全体师生。心理所团队是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雷雨教授与俞老师一起精心组织和主持了课题组的每周例会，全体师生在例会上充分交流，总是让我有很多收获。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韦庆旺

2014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目 录

1. 绪论	001
2. 文献综述	004
2.1 权力的社会认知	004
2.1.1 权力的概念和本质	005
2.1.2 权力的主要社会认知理论	005
2.1.3 权力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结果	011
2.1.4 当前权力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014
2.2 社会心理学中的问责研究	016
2.2.1 问责的概念和作用	017
2.2.2 问责与西方社会心理学	020
2.2.3 问责对我国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024
2.2.4 迈向认知、社会和文化的整合	027
2.3 小结	028
3. 研究问题与设计	030
3.1 问题提出	030
3.2 研究设计	032
4. 研究 1：问责条件下权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033
4.1 研究背景	033
4.2 研究方法	035
4.2.1 被试	035
4.2.2 实验设计	035
4.2.3 自变量操控	035
4.2.4 程序及测量	036
4.3 研究结果	038
4.3.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038
4.3.2 操控检验	039
4.3.3 选择合作的比例	041
4.3.4 选择总得分	041
4.3.5 预期对方选择和双赢动机	041
4.4 讨论	042
4.4.1 问责条件下权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042
4.4.2 性别、权力与问责	043
5. 研究 2：不同规范和问责条件下权力对整合式谈判的影响	045
5.1 研究背景	045
5.2 研究方法	047
5.2.1 实验设计与被试	047
5.2.2 谈判任务	048
5.2.3 变量操作及测量	049

5.2.4 实验程序	050
5.3 研究结果	050
5.3.1 谈判联合收益的描述分析	051
5.3.2 方差分析	051
5.4 讨论	054
5.4.1 权力差异与谈判双赢	054
5.4.2 问责与求知动机的作用	054
5.5 研究 1 和研究 2 的总讨论	056
5.5.1 问责的作用	056
5.5.2 问责对权力效应的影响	058
6. 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构想	060
6.1 权力研究的文化背景及意义	060
6.2 西方权力研究的核心问题	062
6.2.1 西方社会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和困境	062
6.2.2 权力引起的认知特点究竟是什么？高瞻远瞩还是自大盲目？	064
6.2.3 权力引起的行为特点究竟是什么？自我控制还是无所顾忌？	065
6.2.4 权力引起的人际后果究竟是什么？为人造福还是以权谋私？	066
6.2.5 西方权力研究的症结在哪？加几个调节变量就可以解决吗？	067
6.3 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思路	068
6.3.1 作为整合架构的中庸研究	069
6.3.2 对权力的重新构念化	070
6.3.3 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方式	072
6.4 以“仁”用“权”：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现实意义	075
6.4.1 “仁”与“亲社会动机”“关系取向”“互依的自我建构”的区别	076
6.4.2 责任意识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	077
7. 总结	080
参考文献	082
附录 A：研究 1 材料（以权力大有问责条件为例）	092
附录 B：研究 2 材料（以亲社会动机有问责的人事经理为例）	102

1. 绪论

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是权力。权力之于社会科学，就像能量之于物理学。……社会动力学的法则只有放在权力的框架下才能得以阐明。

(Russell, 1938, p.10, 转引自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p.265.)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古老而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包括大众）就权力的产生、使用、腐败与制约等进行了长盛不衰的讨论。然而，用实证的方法（尤其实验室实验法）研究权力的心理则主要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心理学领域发生的事情。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视角不同，社会心理学家虽然也讨论“权力是否产生腐败”这样的现实问题（Kipnis, 1972; Bargh, Raymond, Pryor, & Strack, 1995），但他们更倾向于将权力看作可以通过实验手段操控的权力感，从基础的社会认知视角全面考察权力（大与小）对个体在各种情境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把权力与刻板印象、自动与控制加工、抽象认知、接近与抑制行为、目标导向等基本认知和行为过程联系起来，这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权力尤其是权力效应的认识。

然而，相对于权力小的人，不管是权力大的人由于认识事物更加宏观和抽象而在决策中更有创造力（Galinsky, Magee, Gruenfeld, Whitson, & Liljenquist, 2008），决策质量更高（Smith, Wigboldus, & Dijksterhuis, 2008），还是权力大的人有更好的目标导向和自我调节能力（Guinote, 2007b），都表明权力对权力大的人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不管是权力大的人容易对权力小的人产生刻板印象（Fiske, 1993），还是权力大的人更难以站在他人（权力小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Galinsky, Magee, Inesi, & Gruenfeld, 2006），又都表明权力对于权力小的人具有消极作用。正如 Fiske 和 Berdahl（2007）指出：“当前的权力研究重点关注权力如何影响个体的知觉、情绪和行为，并强调作为‘独立’和‘自由’

体现的权力，对权力大的人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权力小的人具有消极作用。然而，权力应是社会情境中的权力，具有社会性和情境性，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体属性或倾向。通过加强研究真实社会互动系统（两人组、群体、组织）中的权力，我们将对权力在他人在场的条件下对个体具有怎样的影响产生更多的认识（p.688）。 ”

可以说，当前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过于注重权力的“控制”和“自由”含义，而忽视了权力的“责任”含义。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研究者将权力隔绝在社会情境之外，忽视了权力所受到的文化、社会规范、人际关系以及道德等各方面的影响。实际上，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点，并对影响权力的外部因素进行考察。例如，Gardner和Seeley（2001）认为“互依的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能够防止权力产生消极的作用，还将“互依的自我建构”与中国文化中的“仁”对应起来，指出权力的使用在儒家文化的建构下是仁慈的，权力大的人能够为权力小的人的利益考虑。可见，考虑社会情境的权力必然包含着“责任”的含义。不管是外显的还是隐含的有他人在场，或者个体感到自我与他人相联系，自己的行为要受到他人和社会的评价，都必将引起权力与“责任”的联系。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们的想法、感觉及行为如何因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科学研究（Allport, 1985）。笔者认为，“问责”（accountability）的概念充分体现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定义性特征。问责是指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将受到他人的评价，或个体要为其行为向相关的人做解释的情境（Lerner & Tetlock, 1999）。一般来讲，当个体预期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其他人负责任时，会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利益和行为的社会后果。而且，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强调问责，人们更容易感到自己的行为要受到他人和社会的监督和评价（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这与长久以来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差异的讨论是一致的（如，Triandis, 1995）。

笔者旨在将问责引入权力的研究之中，探讨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首先，对“权力的社会认知”和“问责”两个领域的研究进行批判性的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然后，用两个模拟实验研究，分别探讨在囚徒困境和整合式谈判两种背景中，权力在问责条件下对

合作行为和谈判双赢的影响。最后，基于权力和问责研究的整合意义和跨文化价值，以中庸为框架，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权力研究的总体构想，以弥补西方文化背景下权力研究的缺陷，达到通过权力研究与西方的社会认知研究进行对话的目的。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力距离大—权力距离小”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区别的两个最重要的文化维度（Bond, 1986）。不管是跨文化研究还是本土研究，对集体主义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及争论（Markus & Kitayama, 1991; Oyserman, Koon, & Kemmelmeier, 2002; Brewer & Chen, 2007），但结合文化对权力（距离）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实际上，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距离给集体主义文化提供了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章法（如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而集体主义文化又为弥补单纯的上下权力距离大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如集体主义的责任文化为减少权力腐败提供了理论可能（参见俞国良, 韦庆旺, 2009）。

因此，在理论意义上，本书不仅可以丰富权力和问责的研究，而且对社会心理学其他领域，如自我、社会态度、社会认知、群体心理等最近的研究热点（俞国良, 2010）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以说，权力和问责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社会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具有潜在的整合价值。例如，国际上，Fiske 和同事们近年发展的颇具整合性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The Model of Stereotype Content）有望将“能力”与“亲和”两个维度扩展到群体的“权力/地位（大/高与小/低）”和“关系（竞争与合作）”这组更宏观的背景中（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本土心理学方面，Hwang（黄光国）提出的儒家关系主义认为，人与人交往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维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Hwang, 2001）。显然，权力及与权力相关联的合作或竞争的关系是以上两个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实践意义而言，如前所述，本书将对“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提供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对如何防止权力的腐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俞国良, 韦庆旺, 2009）。

2. 文献综述

这部分对“权力”和“问责”两个领域进行了批判性综述。权力部分，首先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梳理权力的社会认知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权力效应的总结，然后指出影响权力作用的因素和权力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问责部分，在对问责及其作用进行论述之后，重点站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和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的视角上，指出了问责研究的重要意义。两方面的综述为第3部分问题提出奠定基础，并为第6部分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构想埋下伏笔。

2.1 权力的社会认知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中古老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包括大众）就权力的产生、使用、腐败与制约等进行了长盛不衰的讨论。然而，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权力的心理则主要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社会认知领域——发生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全面考察权力（大与小）对个体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把权力与刻板印象、自动与控制加工、接近与抑制行为、目标导向等基本认知和行为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形成各种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理论。对权力产生结果性质的探讨，主要在于找出权力的哪些结果是中性的，哪些结果是消极的，以及哪些结果是积极的。毫无疑问，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拓展了人类对权力现象的理解，同时，该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对宏观的社会现象进行基础认知研究的反映之一。

2.1.1 权力的概念和本质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在广义上认可“权力指一个人在即使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概率”这一经典定义（Weber, 1947），但是不同学者对权力的描述仍不尽相同。有的把权力作为结构变量，认为权力来源于各种权力基础（如正式职权）（French & Raven, 1959），因而是一种潜在的力量。有的认为权力就是对他人的影响，把权力等同于影响他人的策略行为。有的则把权力看作社会关系的一个特征，认为权力存在于相互依赖的人（群体）与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当中（Emerson, 1962）。随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认知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权力有了新的认识。Galinsky 等人把权力看作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任何时候对权力的启动都可以激活与权力有关的概念和行为倾向（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本质上，权力是一个人际的概念，具有结构变量的含义，有权力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Keltner, et al., 2003）。不管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其本质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控制，即权力大的人控制权力小的人（Fiske, 1993）。经典的权力相互依赖理论（power-dependence theory）认为，A 对 B 的权力大小等于 B 对 A 的依赖程度（Emerson, 1962）。B 对 A 越依赖，A 对 B 的权力就越大，这可以看作控制含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虽然新近的研究把权力看作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通过启动方法操作权力，但其启动的内容往往是权力的控制含义，如让被试回忆自己控制他人（或被他人控制）的情境（Galinsky, et al., 2003）。可以说，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权力就是控制”。

2.1.2 权力的主要社会认知理论

2.1.2.1 权力控制模型

权力控制模型（power-as-control, PAC）是 Fiske（1993）提出的一个权力如何影响刻板印象（stereotype）和注意的模型。首先，权力就是控制。其次，通过对对象形成偏见和歧视，刻板印象具有控制作用，

没有人愿意被刻板化。因此，对权力小的人形成刻板印象可以成为权力大的人实现控制的一种途径，而刻板化他人的人通过限制刻板印象群体的行为也增强了自己的权力。换言之，不仅刻板化他人增强了权力，同时权力也加强了刻板印象，这就是刻板印象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增强关系。就权力对刻板印象的影响而言，权力大的人更容易以刻板化的方式认知权力小的人，而不是相反。

有权力的人不易被刻板化，但没有权力的人却常受刻板印象对待。权力与刻板印象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影响不同权力个体注意的方向。在权力不平等的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会注意那些有权力的人，即注意那些能够控制交往结果的人。为了预测和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人们搜集有权力人的信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相反，由于权力大的人不受权力小的人的控制，因此也没有注意权力小的人的必要。并且有权力的人经常面对众多无权的人，所以注意的能量限制也使他们不能充分认识了解无权的人，而是对他们类别化，即形成刻板印象。因此，注意决定了谁对谁有详尽认识以及谁把谁刻板化。

有权的人对无权的人进行刻板化认识有两个途径：①忽视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这是不费力的途径，通常无条件地发生；②注意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这是有意识的途径，只有在感到有义务判断他人时才发生（Goodwin, Gubin, Fiske & Yzerbyt, 2000）。换言之，有权力的人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花精力去了解无权的人，而无权的人总是努力搜集有权力人的个别信息以了解他们、预测他们的行为（Stevens & Fiske, 2000）。

2.1.2.2 接近 / 抑制理论

Keltner 等人（2003）在以往权力研究的基础上，用接近和抑制的观点（Carver, Sutton & Scheier, 2000; Higgins, 1997）整合了权力产生的结果，提出权力的“接近 / 抑制理论”，认为提高权力可以激发“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行为接近系统引发与奖赏相联系的行为。相反，降低权力可以激发“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行为抑制系统引发应对威胁和惩罚的行为。如图 2.1 所示，权力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都可以用接近 / 抑制系统来整合。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更能体验到积极的情

绪（Berdahl & Martorana, 2006），更以自动化的方式加工信息，其行为更不受约束，更认为自己的环境充满奖赏而没有威胁（Anderson & Berdahl, 2002; Galinsky, et al., 2003）。

接近 / 抑制理论认为权力大小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社会环境，提高权力将产生自动化的社会认知，降低权力将产生控制性社会认知。自动化社会认知（automatic social cognition）是快速的、轻松的认知，更多的使用认知启发式和简单的规则做判断（Bargh & Chartrand, 1999）。前面提到的权力大的人以刻板印象的方式认识权力小的人就是自动化认知的一种，因此，接近 / 抑制理论扩展了权力控制模型。并且，由于权力控制模型局限于权力与刻板印象的关系，多少包含着权力产生消极结果的含义。而接近 / 抑制理论用接近 / 抑制这一中性的概念整合权力产生的结果，不仅解释了权力引起的包括认知、情绪和行为在内的广泛效应，也没有直接把权力的结果贴上“消极”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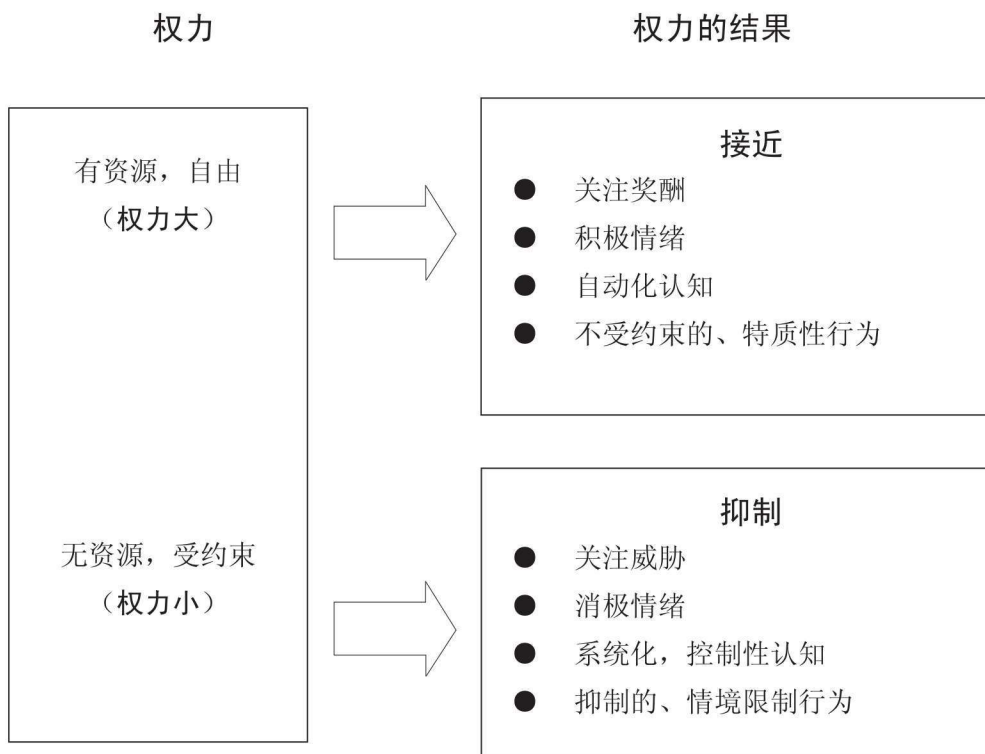


图 2.1 接近 / 抑制理论对权力结果的总结（Keltner, et al., 2003）